

6

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基督徒倫理*

楊鳳崗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五 13~16)

一、引言

根據這幾節聖經經文所說，基督徒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耶穌基督教導他們要作世上的鹽、世上的光。作鹽，讓世上的生活有味道、有意義、有力量；作光，讓世上的生活有光亮、有光彩、

有光明的盼望。

本文是關於基督徒如何在經濟領域裏作光作鹽的一個社會學的研究。如果說論證基督徒應該怎麼樣做，是神學家和牧師們的工作，那麼，發現並且展現出基督徒實際上是怎麼樣做的，就是社會學家的工作了。社會學的進路不同於神學或人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內容是基本上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是通過交談來聽人所言，通過觀察來看人所行。社會學關注的，更多是普通人的情況，而不是名人、領導人或思想家的情況。社會學家在發現了實際是如何之後，還要進行理論的分析，也就是提出一套符合邏輯的解釋，說明為何會出現這些情況，以及有哪些原因導致了這些情況。更準確地說，社會學家會考慮一些因素，看哪些因素跟這個實際是如何有關聯和無關聯，看哪些因素的關聯性更大些。

基督徒有肉體，會有生老病死的健康問題，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當中，也會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問題。基督徒居於特定的地方，處於特定的政治制度底下，置身特定的文化氛圍之中，這些環境因素對其行為都會有一定的影響。換句話說，影響基督徒行為的因素是多重的，不僅有個人信仰的因素，而且有家庭、教會、學校、工作單位等社會組織的因素，以至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的因素。

更進一步地說，信仰的因素也不是單一的，好像所有基督徒都應當有同一的行為模式。應該做光作鹽，這是共同的理想，但是怎樣做光作鹽，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實踐。這種不同來自對聖經的不同理解；對於聖經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神學思想、不同的教派傳統、不同的教會制度；不同的神學，導致不同的倫

理規範和價值觀念；不同的倫理規範和價值觀念，又導致不同的行為模式，而不同的經濟行為模式，甚至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制度。

二、新教的倫理命題

一百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¹提出了一個命題：基督新教的倫理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這個觀點是基於對社會現實的觀察而來：現代資本主義最先在西歐和北美出現，而不是首先在中國、印度、中東或者其他地方出現。為甚麼會是這樣？韋伯分析了多種社會經濟政治因素，發現當時像中國、印度等國家的狀況，在很多方面跟西歐和北美的相差不多，甚至還具備更有利於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比如中國明朝商業相當發達，銀行系統也相當完備，可是卻沒有自發地產生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為甚麼呢？韋伯說，這是因為那些地方缺少了一種現代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精神。

韋伯論述說，有別於以往那些經濟制度的精神，現代資本主義有一種特定的精神，就是積累資本以再投資，即賺了錢不是立即去消費去享受，也不是儲起來留待自己或子孫以後享用，而是用於擴大再生產，讓金錢生出更多的金錢。這種精神追求的是業績——越來越大的業績，不斷創新的業績；講究的是效率——效率來自理性化的生產過程，優化再優化生產過程。這跟「能掙會花」、刺激消費的提法非常不同，是現代資本主義在開始形成的過程中的一種精神，也可以說是一種創業的精神。晚期資本主義

確實有刺激消費的經濟發展策略。不過，生活在美國久了，跟普通美國人接觸得多了，了解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習慣，就會發現，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仍然是廣泛存在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

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是從哪裏來的呢？韋伯認為，基督教的一個神學傳統所帶來的倫理觀念，跟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最接近。用他的話說，基督新教倫理和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有“affinity”，也就是說有密切關係、有親緣關係，兩者非常類似。在十六世紀馬丁路德開創宗教改革以後出現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也就是今天的中文語境中所稱的基督教，跟原有的公教或天主教（Catholicism）有所不同。基督新教反對把神聖與世俗進行人為的分割。要想成聖，成為聖潔，不是只有出家作僧侶一個途徑。上帝的呼召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祂可能呼召有的人去做僧侶、做祭司、做牧師傳道，也可能呼召你去做工程師，呼召他去做商人、呼召我去做教授。只要聽從、順服上帝的呼召，實踐上帝所賦予的特定使命，就能成聖。在這個意義上說，基督新教相信人人皆可成聖，成聖不是少數人、少數僧侶的特權。

在基督新教中很有影響力的一個神學支派是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認為，上帝的揀選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經決定了，是出自上帝的恩典，人無法靠自己的行為將之改變。一個人是否蒙上帝揀選，任何人都不能替他確定，連牧師也不能替他確定。每個人都只能自己直接面對上帝。既然沒有人能夠替你確定，而你自己的行為又無法改變預先被上帝決定了的揀選與否，那怎麼辦呢？加爾文主義認為，蒙揀選是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是帶

有祝福的，這祝福是會體現在生活當中的，因此，如果有上帝的祝福，就間接表明你是蒙揀選的。有上帝的祝福是怎樣的呢？此外在標誌就包括了事業的成功。所以，如果你有上帝的呼召，你可以去賺錢，你應該去賺錢，上帝會祝福你賺錢。但是，你賺錢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不是為了個人在世上的地位和影響，甚至不是為了給自己的家人改善生活，而是為了一個彼岸世界的原因，是回應上帝的呼召。這種信仰，這種信念，成為行動的動力，驅使人們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追求財富，創造財富，而又不貪圖生活的安逸和消費享受。這是一種苦行主義，跟僧侶的清修苦行類似，即所謂苦行僧，但是這種苦行跟僧侶的苦行又不盡相同，因為不脫離世俗，不放棄世俗，而是在世間苦行清修。他也不厭棄財富，而是可以積累財富；積累財富，而又不貪圖享受。韋伯發現，很多創業資本家一生都極為簡樸，日常生活井井有條，規規矩矩，沒有不良嗜好。在某些人看來，特別是在當今一些年輕人眼裏，這樣的生活實在太單調乏味，不夠刺激，也不懂得享受人生。不過，在奉行加爾文主義的基督徒那裏，卻會覺得這種生活才最有意義。

這種工作倫理，這種生活態度，這種世界觀人生觀，是非常理性化的，是非常有秩序、有效率的。韋伯說，這種倫理跟為賺錢而賺錢，不斷擴大再生產、講究效率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是合拍的，事實上不僅合拍，甚至可說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出現的關鍵因素或必要因素。在西歐北美，先有這種基督教倫理，然後才有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再之後才有工業革命。基督新教倫理在先，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在後，這種先後，在韋伯看來，並

非偶然，不能說這種倫理直接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因為這需要多種因素的配合，但這種倫理卻是關鍵因素，必須因素。在沒有這種倫理的社會，即使具備了其他的物質條件，現代資本主義仍不會在其中自發生產。²

當然，也要指出，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倫理，並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現代資本主義這個目標而設計的。它對經濟行為和經濟制度所產生的影響，是個未曾預計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是個副產品。再者，資本主義讓金錢增值，並不一定需要一個超驗的目的，但是，對基督徒來說，超驗的目的卻是不可或缺的，是核心的。這是兩者並不完全合拍的地方。所以，可以說基督教是倫理道德的宗教，但倫理道德不是基督教的全部，甚至不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

三、中國的市場經濟

中國大陸由共產黨帶領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以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1979年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開始時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一個清晰的改革目標。摸了十多年，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上，才正式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成為政府政策所努力的方向。從過去的計劃經濟到未來的市場經濟，有一個轉變過程。所以我們說，從1979年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是處在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過程當中，也可以說是處在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過程當中。從韋伯的論題出發，我們可以問：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基督教倫理發揮了甚麼作用沒有？

這裏還要先澄清一個概念。居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堅持說中國要發展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區別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知道這樣講是因為有政治的考量。如果撇開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話語系統，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可以說中國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其實也就是韋伯所說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裏說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而是對於一種經濟制度的定義，指的是市場經濟制度。

韋伯特別強調他所說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也叫**理性資本主義制度**。它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資本主義，而是整個物質生產過程都市場化。在過去，商業交換只是生產和生活的補充，人們只在自己的出產不能完全自給自足的時候才去做些商業交換。比如中國農民的理想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農民生產的直接目的不在於交換所有。而在現代理性資本主義這裏，生產的直接目的則是把產品推向市場，在市場上通過交換而賺取利潤，是為了利潤而生產。這種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以最小的投入和最優化的過程，生產出能獲得最大利潤的商品來。這樣的經濟制度自然會趨向或導致規模化生產、專業化生產，要求不斷降低成本，不斷提高效率。當這樣的市場經濟佔據了社會的主流時，一個經濟上現代化了的社會也就形成。

現代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歐和北美出現，然後向其他地區擴散。在亞洲，先是日本，然後是所謂四小龍（韓國、台灣、香

港、新加坡)，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經濟都有極大的發展。隨後，東南亞幾個國家，特別是有華裔商人企業家的社會，也有了快速增長。但是，人們發現，亞洲的資本主義好像跟歐美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比如在幾個華人社會中，家族企業好像很多，大型企業相對較少。在東亞經濟開始起飛之後，有些學者和政界要人開始高談儒商精神，宣稱華人社會的經濟發展，以及東南亞國家由華人主導的經濟的發展，是由儒家倫理促成的。有些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甚至提出獨特的東亞現代化模式這一概念。³

韋伯提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之後，又曾考察印度宗教和中國宗教，並且論述了在儒家統治下的中國未能自發產生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因為那裏缺少了基督新教倫理，或類似的倫理。韋伯有關中國宗教的論述，受到很多中西學者的各樣挑戰。在這裏我不想對此詳細討論。

在韋伯的時代，中國還沒有多少人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已經不同了，基督教不論在中國大陸還是海外華人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⁵不少學者注意到，華人基督徒也大多知道，中國人轉信基督教之後，很多人並沒有完全拋棄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Constable 1994; Yang 1999）。華人基督徒還是相當注重家庭，注重孝道，注重敬老愛幼，注重人際關係。如果按韋伯所說，基督新教的倫理有益於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傳統的儒家倫理卻不利於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那麼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那些皈依了基督新教而又秉承了儒家傳統的人，他們的倫理是一個甚麼樣的狀況呢？他們的倫理是否有益於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呢？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還沒有被認真研究的問題。

對於倫理道德的關注，也是個重要的現實問題。當市場化的浪潮開始猛烈衝擊中國社會的時候，也就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人們突然發現，在市場經濟到來之時，倫理道德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有個民謠如此描述那時的狀況：

十個人八個商，還有兩個要開張；
十個人八個賭，還有兩個是候補；
十個人八個喝，還有兩個要湊桌；
十個人八個跳，還有兩個倒股票；
十個人八個賤，還有兩個婚外戀。

很多年基本絕跡的妓女、性病、賭博等社會問題都重新出現。追逐金錢成為時尚，不擇手段非常普遍，影響及於社會各個階層。有民謠說：

一等公民掌實權，批條畫圈就來錢；
二等公民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標；
三等公民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
五等公民搞租賃，汽車洋房帶小姘；
六等公民手術刀，割開肚子要紅包；
七等公民當銷售，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公民幹個體，宰了老張宰老李；
九等公民老大哥，工廠關門沒吃喝；

十等公民作田佬，交了糧食收白條。

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坑矇拐騙到處盛行。那時最為流行的是所謂「厚黑學」，就是怎樣厚著臉皮賺黑心的錢。賺錢可以不擇手段，「該出手時就出手」，只要得手就把買主狠狠地坑一次，這叫做宰上一刀。人際關係遭到極大破壞。有一首民謠便說：

五十年代人幫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各人顧各人，

九十年代見人就「宰」人。

賺錢可以不顧親情，甚至出現所謂「宰熟」現象，即「宰」熟人，因為越是親近的人，越容易矇騙，即使是親近的熟人，下手也照樣毫不留情。面對這種現象，很多人驚呼中國的社會道德正在滑坡，甚至已在崩潰之中。知識分子常被稱作社會的良心，但是很多知識分子也已放下清高，走向世俗，下海經商。

面對這種道德狀況，中共中央在推進依法治國的同時，又提出要以德治國，試圖加強對民眾的倫理道德教育。問題是在經濟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在黨政機構和工作單位的社會控制功能逐漸減弱之後，怎樣才能進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呢？靠中小學的教育嗎？那些接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人，一旦進入社會，有多少人還能持守那一套道德倫理原則呢？共產黨

員和共青團員不也有許多人加入為金錢而不擇手段的大潮流去了嗎？所以有人提出要利用一切有益的道德資源。

也就是在這個社會劇變的大背景中，中共中央提出，宗教或許可以在社會道德方面做出積極貢獻。在過去那種極左的意識形態統治下，宗教被看作是完全消極的東西，甚至是反動的勢力，最好是把它剷除乾淨。在發現無法剷除乾淨後，只好勉強允許它存在，但認為必須嚴加限制，為的是要限制其消極甚至反動的社會影響。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對宗教的看法有了重大的轉變，指出宗教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可能有助於維持社會的道德秩序，關鍵在於如何引導宗教為社會道德秩序服務。所以，在看到宗教的道德潛力之後，中共中央提出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說法，認可了宗教在道德方面的可能貢獻。

四、研究課題的設計和方法

在突破了反宗教的無神論教條主義之後，中國人很容易想到的一句話是，「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但是，真的是所有宗教都有益於社會道德秩序嗎？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某些宗教的極端教派是會破壞社會道德秩序的。更進一步說，不同宗教倡導的是甚麼樣的宗教道德？如果我們採納社會學的認知方式，就會做具體的區別，做進一步的分析。中國社會中有眾多不同的宗教倫理體系，其中哪些是有益於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維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呢？為了解這個實際是如何的問題，我們設計了一個研究課題，研究基督教在中國市場轉型當中所發揮的倫理功能。⁶我們

也願意研究其他的宗教，但我們從基督新教入手研究。

由於中國的市場化在城市中有更多的發展，所以我們選擇只研究城市裏的基督徒。大家可能熟悉中國基督徒的所謂「三多」或「四多」現象，即中國基督徒中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再加上一個在農村的多。不過，基督教從兩千年前產生以來，就是首先在城市市民中傳播開來的，主要是個城市現象。「四多」的概括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帶有偏見的，即把信教和愚昧落後聯繫起來。在絕對人數上講，基督徒是在農村的多。但是如果從相對人數來說，今日中國的農村基督徒對城市基督徒的比例，未必高於農村總人口對城市總人口的比例。這是第一。第二，伴隨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也在迅速走向城市化。根據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鑑，1978年有82%的中國人口居於農村，到了1998年，農村人口減少到70%；二十年間，城市人口增加了12%。而實際上還不止這數字，因為很多農村的人進城作了所謂農民工。在這樣的趨勢下，城市基督徒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所以我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城市。

由於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沿海和內陸有很大差異，在南方和北方也有很大差異，所以我們分別在沿海、內陸、南方和北方選擇了一些城市來研究。從2000年夏天到2003年初，我們在8個城市進行了調查。這8個城市四個在沿海，四個在內陸；其中四個沿海城市從南到北間隔分佈，內陸的則包括了一個在大西南、一個在大西北的城市。在規模方面，有的是大型都市，有的是中型城市，有的是小城市。

在每個城市，我們都有一個研究助手，在那裏進行至少一個

月的集中調查。有些城市的調查進行了兩三個月，或者進行了多次回訪。調查方式包括參與教會的各樣聚會活動，以及記錄牧師的講道、信徒的見證、禱告的內容等。不過，更多的工夫是花在與信徒的深度訪談上。我們特別注意與基督徒老闆和公司職員的訪談。在有些地方，我們還對基督徒老闆的生意場所進行了觀察。

在中國開展這樣大規模的、系統的宗教社會學調查研究還不多。其間遇到很多困難，很多挫折，也有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們克服了種種障礙，終於完成了這樣一個大型調查項目的田野調查階段，匯集了非常豐富的數據資料。這些數據資料是如此之多，以致我們還要花很多時間和功夫去梳理、分析。我們也在爭取把結果整理發表，供大家閱讀參考和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才公開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因為在國內發表這樣的調查報告還有很大阻力。我這裏報告的，可以說還只是個初步的梳理，只是梳理出了一些粗線條，很多地方還沒有來得及做細緻的工作。下面從三個層面簡要總結我們的發現：基督徒個體、基督徒團體、基督徒對於政府的參與。

1. 基督徒個體

基督徒個體可以分為基督徒雇員和基督徒老闆兩個方面。這涉及工作倫理或職業道德、以及商業倫理、管理倫理等問題。

i. 基督徒雇員

人們為甚麼努力工作？工作的動力來自甚麼地方？以前在計

劃經濟體制下，工人工作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來自意識形態的宣傳鼓動。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這是〈為人民服務〉一文中的一段話。就是說，努力工作是因為應該為人民服務，為國家的富強服務，為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同時，也有獎勵作為輔助辦法。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年年評定勞動模範、優秀共產黨員、優秀共青團員等等，給予社會榮譽，給予政治地位。雖然得到這種頭銜的人總是少數，但可以借此鼓勵人們努力工作。除了頭銜外，當然也有物質上的獎勵，比如努力工作的人可獲提高工資、提高住房等福利待遇。另外也有紀律處罰作為控制手段。在走向市場化後，革命的理想主義這個動力失去了原有的效力。有句廣為流傳的順口溜說：

提到共產主義就冷笑，
提到馬列主義就譏笑，
提到社會主義就失笑，
提到為共產主義奮鬥就哈哈大笑。

勞動模範和優秀黨團員的社會榮譽也不夠實惠了。結果，似乎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調整工資和獎金。但是，單純倚靠這個也有很多問題，因為這只是外在的「物質刺激」，而不是調動人們的內在動力。經過了多年的嘗試之後，發現還是要提高人們工作的內在動力。雖然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動力不如從前了，但理想主義本身並沒有完全失去效力，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青團仍然是

龐大的社會組織制度，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黨員團員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優秀的人。所以，我們就看到，航空公司的空姐們佩戴共青團團徽、共產黨黨徽，溫州私營的鞋子專賣店的服務員也佩戴共青團徽，不過，細問之下會發現，佩戴團徽的人不一定就了解共產主義。雖然缺少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內涵，但在有些人那裏保留了社會道德的評價標準。可是，即使所有黨團員都是道德高尚的人，黨團員人數在社會上總歸還是少數。

在這樣一個社會狀況中，我們發現，很多企業到教會去招募工人。在我們研究的好幾個城市都遇到這種情況，就是有人到教會來招工。招工的基本上是些獨資、外資、合資的三資企業，因為這些企業難以利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宣傳鼓動和社會控制機制。公司老闆未必是基督徒，但是卻願意到教會來招工。這說明他們對基督徒工作態度的信任。

基督徒作為雇員，作為職工，是比較誠實可靠的。我們所採訪的基督徒職工，常常用聖經上的教導來提醒自己，不少便直接間接地引用以弗所書六章 5 至 8 節的話：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無論老闆在場或者不在場，基督徒都比較誠實可靠，有內在動力把工作做好。溫州市基督教會編選的《讚美詩篇·增訂本》(2000)就有這麼一首詩歌〈誠實話〉：

無論事情怎麼樣，常講誠實話：

無論生活閒或忙，常講誠實話：

永不離棄這良規，深深印在你心懷，

寫在座右常思維：「常講誠實話！」

誠實中間有樂趣，常講誠實話：

謊語中間有卑鄙，常講誠實話：

慣說謊話怕改除，甘心欺騙是懦夫，

快快奮興謀振作，常講誠實話！

雖然有錯當明認，常講誠實話：

必須努力求得勝，常講誠實話：

文過飾非說謊話，一誤再誤過尤大：

千萬就真離虛假，常講誠實話。

基督徒不僅是誠實的，而且是勤奮工作的。《讚美詩篇·增訂本》(2000)有一首〈快樂服務〉：

我們做工雖辛苦，卻能榮耀天上父。

淡茶飯，粗工服，頂風冒雨精神足。

身健康，心安舒，作光作鹽勤服務。

我們種田雖辛苦，卻從其中得天福。

小村屋，平安住，門前有花又有樹。

學相愛，互幫助，天天讚美主耶穌。

無論做工或務農，各樣事情要盡忠。

莫貪名，不求榮，耶穌基督在心中。

多禱告，常歌頌，愛主愛人樂無窮。

這只是很多類似詩歌中的兩首。據溫州教會的牧師說，這些詩歌是信徒們喜歡唱和經常唱的。在禮拜聚會時的講道和詩歌中，在信徒的彼此分享和禱告中，不斷提醒信徒要誠實可靠、勤奮工作、為的是榮神、益人。長期下來，誠實、勤奮成為基督徒的一種生活態度，不再是外在的束縛，而是已經內在化。有些人有時不能持守了，傳道人就會在講道和唱詩中定期予以提醒、令人幡然悔悟，重歸正途。

當然，勤勞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不僅是基督徒才這樣。不過，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這樣。在溫州採訪一位基督徒老闆時，她講到這樣一件事。他們公司為了響應政府的扶貧號召，幫助貧困地區的人，所以到革命老區沂蒙山區招來一些村民到他們的工廠來做工。那時是冬天，這些憨厚誠實的山東漢子因著能夠從山區來到這沿海城市打工而興奮不已，為有這麼個掙錢機會而高興，幹起活來都很努力。第一天下來，老闆和工人都很高興；第

二天還是很好，可是第二天，當老闆走進車間時，卻見不到這些工人。到宿舍去看，原來他們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覺，就是懶在那裏聊天。老闆感到奇怪，問他們為甚麼不去做工。他們說這是大冬天，哪能天天都做工呢？原來，在他們的山區農村，漫長的冬天是農閒季節，是享受清閒的時候。

基督徒雇員不僅誠實、勤奮，而且選擇工作時，不會單單看重金錢。我們採訪的年輕基督徒，很多都是近幾年才皈信基督教的。其中有些人信了基督後，辭去了原來的工作。因為信仰而轉換工作的，大多是離開原來的娛樂行業，比如夜總會，或者房地產中介的工作等等。例如有一個曾經吸毒和放縱性慾的女子信了基督後，不再做房地產中介，轉而到母親的影樓工作，原來做啤酒推銷的某男，轉做園藝假山。過去那種工作雖然掙錢不少，但是違背自己的良心。他們以前也有良心不安，但未必採取行動，信了基督以後，就有了信仰的動力，因此改換工作。想賺錢，多賺錢，這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但是賺錢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不能違背自己的信仰，這是宗教信徒才會有的想法和做法。

這裏我也不是說所有的基督徒做得都這麼好。基督徒之間是有差別存在的。比如有一個大四學生，獲聘做一個台商老闆的助理，經營多間子公司。老闆拜佛，子公司的業務包括娛樂事業。這個準畢業生也了解到這些業務有點違背自己的道德觀念，但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捨不得放棄。他解釋說，雖然老闆信仰不同，但沒有強迫他也去拜偶像，至於娛樂子公司，他也會盡量避免參與管理。作為一個將要畢業的人學生，毛頭小伙，他承認自己沒有能力改變老闆的信仰，也沒有能力改變老闆的生意選擇。

只想盡可能地獨善其身。不過，因為有信仰的提醒，他內心仍是有掙扎的。雖然如此，在我們採訪他時，他還沒有決定辭掉這份工作。

在北方某沿海城市，一個年輕女基督徒的煩惱就顯得更強烈些。我們剛認識她時，她在一家國營外貿公司做會計。據說幹外貿這一行的，不作假賬的很少。她信基督以後，老闆再次要她做一筆假賬時，她猶豫了，心中感到不平安，可是又不敢告訴老闆她為甚麼不做，因為信基督在這間國營公司中並不是甚麼光采的事。拖了一段時間後，老闆追問下來，她就只好說她覺得不能再做假賬了。老闆很吃驚，這樣一件普通的事，以前做過多次的事，怎麼現在不能做了呢？老闆再三催問，她只好坦白承認自己信了基督教，基督徒不能說謊，不能做假賬。老闆聽後非常生氣，不僅覺得她迷信，誤入歧途，而且還影響了他公司的業務，就跟她說，你必須做，不然就走人，而且更進一步威脅：你如果走人，就甭想再幹這一行。這位國營外貿公司的老闆在當地外貿行業很有影響力，他要想阻止一個人進入別的外貿部門，是絕對有能力的。在那個北方城市，三資企業還較少，下崗的人則很多，所以，丟掉這個外貿公司的美差很可惜，而且會面臨找新工作的極大壓力。為這件事，這位女基督徒非常苦惱，猶豫了很久，後來，我們知道她終於還是辭了那份工作，轉到了其他行業。

可以看出，基督徒選擇工作時，並不都是單單考慮信仰自身。有些基督徒在工作上做出了妥協，其中有些是因為歸信的時間較短，有些是因為信仰的根基不夠深，也有些是受當地的經濟

狀況所影響。在北方城市，就業機會少，非市場化因素多，基督徒的掙扎就更艱難些，更不容易下決心更換工作。但是在南方城市，我們採訪的基督徒中，很多人都換過工作，甚至換過好幾份工作，其中不少是因為信仰的考慮而轉工的。對這些人來說，換個工作好像並不是太大的難題，因為那裏的市場經濟更加成熟些，機會更多些。

事實上，有些人之所以做起老闆來，就是因為不願意跟從非基督徒老闆做違背良心和信仰的工作。無論在南方還是在北方，我們都採訪過這樣的基督徒老闆。正如有句順口溜所說的：「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就當個體戶。」個體戶從做小本生意開始，有些發展成為有規模的企業。

ii. 基督徒老闆

市場經濟需要企業家和商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來，湧現了很多企業家和商人，但他們的名聲並不很好。這些年中國人上了美國雜誌富人排行榜的越來越多，但上了榜的人大都沒有好下場。樹大招風，一旦出了名，政府部門就來查，一查就常常查出問題來。逃稅漏稅已經算不得大事，更多的是賄賂等違法犯罪行為，這樣的很多人物和事件大家都耳熟能詳。之所以耳熟能詳，一方面是因為確實有很多人致富的道路不正，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傳統的道德觀念影響了人們的看法所致，即認為無奸不商，反過來推論便是無商不好。對於奸商的批評，如果是從傳統的儒家重農輕商的倫理出發，就可能否定商人和企業家可以有很好的倫理道德。我們的採訪卻發現，基督徒商人企業家是可以遵守

倫理道德原則的，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對他們的商業行為是有影響的。這種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最經常被基督徒老闆提及建基於信仰原則的商業行為，都是涉及跟客戶的關係。第一是注重發展長期的信任關係，而不是貪圖一次性的獲利。你可以生產或銷售假冒偽劣產品，但是，一般來說，這樣的產品只能賣給同一個客戶一次，上當受騙之後他不會再來第二次。你謀得了一事之利，卻不能長久這樣賺下去。所以，基督徒老闆說，最好是跟客戶建立信任關係，信得過我的產品，就會有回頭客。贏得回頭客才是生意得以持久發展的基礎。第二是跟客戶談業務時，基督徒老闆基本上堅持不去娛樂場所。在中國談生意，常常是在飯桌上談的，酒過三巡之後才談生意條件。有些甚至要招待客戶去一些聲色場所，找三陪小姐。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這在跟國營公司和政府採購人員打交道時更多發生。當客戶提出這類要求時，基督徒老闆常會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說明自己不能去這樣的場所。如果客戶堅持，而老闆又實在要賺這筆錢，有的基督徒老闆也會做一定的妥協，比如給客戶出錢去進行這樣的消費，但自己不去。他們說，這樣的不近人情的確會失去一些成交機會，但更多的時候會贏得客戶的敬重和信任，甚至成為一個傳福音的機會，因為客戶會很不理解，有的客戶會追問原因，他就可以給他解釋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有個做醫療器材的基督徒老闆說，有些人情還是可以盡的，比如免費招待外地採購員住宿和飲食，但他堅持不在酒桌上談生意、吃飯歸吃飯、生意歸生意，合同還是要到辦公室去談。

我們在研究中又發現，不少基督徒老闆為自己的公司起了帶

有基督教色彩的名字，比如迦南閥門廠、福音琴行、神力集團，等等。其他基督徒看到這樣的公司名字會心中有數，因而有利於產生信任感而成交。不過，由於基督徒在中國人口中仍然是少數，很多人未必知道這些名字具有基督教的含義，因此當客戶問起公司名字的意思時，便成為基督徒老闆傳福音、做見證的機會。有些公司名字的基督教含義並不那麼明晰，但是老闆和公司高層都非常清楚。這一方面是希望有上帝的護佑，另一方面是讓這名字至少成為一個警惕，提醒自己在做生意時不能有辱主名，要作光作鹽作見證。比如，江蘇宜興的思聖環保設備有限公司，公司的標記花環圖案中鑲嵌了醒目的十字架。總經理周國雲15歲時由母親帶領信基督，她說「思聖」就是時常思想聖經，規範自己的行為及其企業經營管理活動。

在轉型時期的經濟中，敢於這樣打出基督教招牌旗號來的老闆是要做好心理準備的，有些可以賺的錢不能去賺了，有些別人可以做的事自己不能做了，這是堅持道德倫理名譽的代價，而這些基督徒顯然都樂意擺上這樣的代價。無論是否選擇一個基督教化的公司名字，基督徒老闆在選擇公司的業務種類時，常常表現出信仰的考慮，因此，在我們所採訪的老闆中，沒有人去經營夜總會等有傷風化的企業。在南方城市，不少基督徒商人經營人力資源諮詢公司、人才市場、國際貨運、園林建築、保險公司，等等。

基督徒老闆們賺錢的動力是甚麼？正如基督徒雇員有一句經常引用的聖經經文一樣，我們採訪的很多基督徒老闆都引用或提到了耶穌有關好管家的比喻。⁷這些基督徒老闆說，他們賺錢，

不過是作為這些錢的代管人，上帝纔是這些錢真正的主人，上帝交給我們管理的錢或多或少，是上帝的事情，我只需盡忠職守就是了。而且，不少老闆都提到路加福音十二章48節：「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換句話說，越是賺得多，越需要感謝上帝並且為上帝所用，而不是貪圖自己的享受。這也就是說，很多基督徒老闆賺錢的動力是來自超越這個世界的上帝。

不過，我們發現很少有基督徒提到上帝的預選這個加爾文主義的重要信條。提到遵守倫理道德、努力追求成功的動力時，很多基督徒老闆都提到是為了榮耀上帝，為了不辱主名，為了用自己的行為向非信徒做見證、傳福音。這種用行為示範的方式傳播信仰的想法，來自典型的東方文化傳統。正如韋伯所說，西方的先知是倫理先知，用來自上帝的絕對律令來向人說話，而東方的先知是模範的先知，用自己的行為做示範以引導他人的追隨。這或許可以看作是中國基督教倫理的獨特所在。

中國的經濟目前仍然是處於轉型時期，當中有很多不符合市場經濟的法規和潛規則。我們採訪的一個基督徒大老闆，他早年就曾經因為投機倒把而坐過監獄。所謂投機倒把，就是從一個地方買來東西，再轉賣到另外一個地方。他倒賣的是閥門，先從一個工廠那裏買來，因為那個工廠囤積了很多，閒在那裏沒用，有些放得過久，都生鏽了，所以樂得賣出去賺些錢，而別的工廠想跟政府的主管部門申請調配這種閥門卻得不到，因而影響生產，所以也樂得向他購買。這在當時（八十年代初期）是違法的，因為那時的法律規定生產資料要由國家經濟計劃部門統一調配，不允許私人介入。今天看來，那種法律是有問題的，是跟市場經濟

相違背的。所以，雖然說這個基督徒商人觸犯了當時的法律，但是這樣的觸犯法律不僅沒有違背基督教的倫理道德，而且實際上正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多了，才推動法律法規的調整改變，改掉違背市場經濟的、訂定符合市場經濟的。當然，他的投機倒把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就是他把買來已經生鏽的閥門，重新刷一層漆，然後告訴買方說是新的閥門。這是有些問題的，儘管他並沒有完全說謊，因為那些閥門的確是沒用過的，只是他沒有告訴人家是生過鏽、重新刷過漆的。所以，在坐監獄的時候，他自己反省，向上帝認罪，請求上帝饒恕，並賜他新的機會。

在轉型時期的企業所面對的另外一個大問題，是繳稅問題。我們採訪的有些基督徒老闆說他們該交的稅都交了，而且還積極響應政府的倡議，參與扶貧和救濟。不過，也有不少基督徒老闆承認自己沒有按規定繳納所有的稅。他們說，如果繳納所有的稅，就意味著賠錢或關門，他們就根本不能賺錢，甚至不能維持下去。這讓很多這樣做的老闆心中不平安，可是又覺得別無選擇。我們採訪到一個外資企業的華人主管，他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他指出很多公司其實都逃稅漏稅，因為目前的稅收法規或政策有問題，把稅定的很高，名目很多，結果是逼良為娼，迫使多數公司逃稅漏稅以求生存和獲利。這主管所屬的公司是間跨國公司，堅持繳納所有規定的稅費，結果是來到中國多年還沒有賺錢，反而虧蝕了很多。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公司的財力雄厚，有能力蝕得起，而且他們把目光放在長遠的未來，相信經濟改革的深化終將帶來盈利的機會。但是，很多國內的公司和外資小公司可賠不起，所以只能盡量逃稅漏稅。據他了解，實際上交稅的公

司只佔盈利公司的少數，比如可能只有 20% 的賺錢公司繳稅，大多數的公司都千方百計去逃稅。他問：為甚麼稅收部門不降低稅率，讓多數公司在繳稅之後仍然有盈利，同時加強執法，讓所有盈利的公司都一定繳稅呢？降低稅率而健全稅收機制，就可令 80% 的公司繳稅，這樣政府收上來的稅不會比目前收上來的少，而且也更公平、更合理、更健康。現時的高稅率政策不僅收不到很多的稅，而且事實上鼓勵了逃稅漏稅做假賬的行為，或者鼓勵企業想方設法地賄賂稅收官員，結果受損的只是國家，以及願意奉公守法的公司。總之，目前這種不合理的稅收法規和執行造成很多問題。這個外企的高級主管說，他一有機會就跟政府官員表達他的看法。

基督徒老闆在中國已經形成一股力量。浙江大學的陳村富等人就此寫過一篇英文文章，論述「老闆基督徒」的現象及其特殊地位。他們所說的老闆基督徒包括了高級管理人員。這些人有知識、有能力，而且有地位、有影響。在教會裏，牧師傳道人都都尊重他們，因為牧師傳道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他們可以做到，特別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令他們能夠跟政府官員溝通，政府官員也比較多地接納他們的建議。而且，跟他們打交道的官員都是負責經濟或政治，比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更有實權和影響力，有的時候通過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不能辦的事，他們卻可以通過其他政府部門而辦成。

2. 基督徒團體

在團體層面上，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當中的倫理影響是很

有局限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教會落後於社會，二是基督徒自發團體的尷尬地位。

i. 教會的局限

我們知道中國目前有兩種教會：一種是公開存在的、受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領導的教會（通常稱為三自教會），一種是不被政府承認的教會（通常稱為地下教會或家庭教會）。這兩種教會目前都有自身的局限，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影響也受到很多限制。

關於公開的教會，我在採訪一個省的三自會負責人和神學院負責人時，他們當中的一個中青年人有一樣一個提法：教會落後於社會。他說，教會中的老一輩領導人做事都縮手縮腳，畏首畏尾，總怕觸犯了政府的政策和規定。有的時候，政府宗教管理部門都跑到前面去了，教會領導人還跟不上形勢。我也聽到一個省級三自會負責人主動跟一個省級統戰部官員提出，要政府去管一管一個未經申請的神學培訓班，可那官員聽了之後並沒有甚麼反應，大概他沒覺得那是個需要管的事件。

在教會落後於社會的情況下，教會很難提出一套領風氣之先的東西來。其實，公開的教會在過去這些年來所做的，也就只是維持。其實連維持的工作做起來都已經力不從心了，因為歸信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可是正規神學院畢業的人數一直不多，供不應求。比如，按照官方的統計，1982年時，每一個牧師傳道要牧養508個信徒，到了1995年，一個牧師傳道要牧養556個基督徒。我們看到很多地方的牧師都是超負荷工作，照看信徒的婚喪

嫁娶、家庭、情感、病痛等普通需求已經讓他們精疲力盡，根本無力靜下心來好好思考市場經濟和商業倫理等問題。有的信徒遇到問題後去找他們，他們除了引用聖經說一些原則性的大道理，或者敷衍一番以外，也很難給信徒提供很有價值的指導和輔導。在問及他們有關基督教倫理的問題時，他們常說沒有思考過，也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教導信徒。神學院已經開始嘗試開設基督教倫理課程，但是授課老師本身缺少這方面的培訓，也沒有合適的教材；找西方國家基督教倫理的教材又不適用，因為那些教材的內容很多是關於同性戀、克隆人等問題的，這些問題不是中國基督徒當前面對的主要問題。總之，公開的教會對市場經濟中的倫理問題難以提供很有效的教導和指導。

那麼不公開的教會呢？第一，它們的重點是傳福音，沒時間對基督教倫理做系統的思考。第二，很多地下教會深受基要主義的影響，對於現代化、經濟等屬世的事持完全的批判和拒絕態度，其神學進路阻礙了提出適合當前形勢的系統的倫理思想。另外，對於近年來城市地下教會的發展，目前還缺少研究，所以在此不多分析。

ii. 基督徒商人團契

在上述兩種教會之外，出現了一種自發組織的基督徒商人團契。我們在南方一個城市對這樣一個商人團契做了較多的觀察和了解。這個團契當時成立還沒多久，基本上是一個月一次聚會，內容除了唱詩以外，還包括見證、講座、分享交通。他們會請一些在公司做主管的基督徒來，分享他們在事業和信仰上的經歷和

認識。他們也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比如給客戶回扣是否違背基督教的原則、繳稅問題、跟雇員的關係問題等等。據團契的主席說，他們在很多問題上並沒有標準的答案，但大家都願意一起查閱聖經。有時在互相交流和查經中有了新的看見，大家願意根據聖經的原則來調整自己的做法。

參加這個商人團契的都是些三四十歲的中青年人，有些是自己開公司的，有些是在外資公司作高級管理的，也有跟外資公司合夥做生意的。對於參加者來說，因為弟兄姐妹彼此信任，而且都是老闆級人物，有共同關心的問題，也有相同或類似的情況需要處理，比如跟客戶的關係、跟雇員的關係、跟政府官員的關係等等。而他們一般都不是同行，沒有生意上的利益衝突，所以比較容易分享自己的內心感受、遇到的問題、需要代禱的事項，等等。

這些基督徒商人，星期天去公開的教會聚會，有些在教會裏還作義工，但是他們的商人聚會既不屬於教會，也不能跟教會公開。他們得不到教會牧師的輔導，因為牧師沒有能力輔導他們。他們也不算一個固定的聚會點，因為是在不同老闆的辦公室輪流舉行聚會。所以，從宗教事務管理的法規來說，他們的團契不是合法的聚會，難以取得合法的地位。亦因如此，他們的活動必須保持低調，只邀請確實信得過的人來參加，限於小範圍的接觸，這使得他們的影響力也很有限。其實這個商人團契的主席是個非常有能力和有遠見的人，是可以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推廣商人團契的。要是在海外，早就可以成立一個獨立的基督教機構，推展這方面的事工，但在目前的中國就不可以了。政府的政策束

縛了商人團契的發展，亦因而限制了有利於理性化市場經濟的商業倫理的影響。儘管如此，類似的商人團契在其他一些城市還是悄然出現了。

3. 基督徒對於政府的參與

從人數上來說，基督徒在中國大陸仍然是個少數。即使在有「中國的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基督徒也不過佔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而且，中國目前制度化的民主機制仍極其有限，選舉還只停留在村一級的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有參與政府決策的途徑嗎？不多，但是也不是沒有。前面提到，基督徒商人有著特殊的社會地位，其中有些人可以對某些政府決策作出貢獻，比如溫州總商會的會長就是基督徒。他在2002年成為會長之前，已作了十年的副會長，而總商會也就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工商聯合會。我們採訪這位會長時，他才剛剛從一個行業協會的成立大會回來。他把自己在會上發表講話的稿子給我看，那裏特別提出要建立有誠信的企業。

很多人知道，溫州人原來就很有名，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卻以生產假冒偽劣產品而出名。今天，溫州人的形象已經轉變。溫州人工作勤奮，能吃苦，敢闖蕩。溫州的產品質量高，有品牌，講誠信。溫州人形象的改變，基督徒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前面提到溫州總商會的會長是基督徒，他之前作了多年的副會長，這點至少可以顯示基督徒應有一定的貢獻。具體的情形，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現在溫州商會遍佈全國各地城市，有一百多個。參加溫州商

會的雖然不都是基督徒，甚至可能多數人不是基督徒，但是其中也確實有不少基督徒。我們了解到，不少溫州人之所以到外地去做生意，其動力來自信仰。比如溫州商會的會長說，他的房地產開發做到了青海的西寧等偏僻地方。他在決定到甚麼地方去投資時，總是會考慮那裏的教會需要，生意地點選在離教會不遠的地方，並且設法幫助當地的教會事工。我們也了解到，現在很多城市有溫州人的基督徒聚會，有些是私下聚會，有些則被請到當地的三自教堂去聚會。在拉薩的基督教會就是由溫州商人開辦起來的，他們一面經商，一面傳福音，他們的商業倫理觀念和行為直接影響到當地人的商業倫理觀念和行為。溫州商人基督徒跟地方政府官員打交道，也是受到尊重的，有些人甚至成為當地政協的委員或領導人。他們是有機會參與當地政府決策的，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各地的溫州商會，以及商會中的基督徒的情況，還需要更系統的研究。

四、結語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調查研究基本上支持韋伯的論題。就是說，當代中國基督教倫理和現代理性市場經濟制度的精神是相符的。基督徒商人企業家的存在和努力把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朝著一個方向推動，這個方向就是現代的、理性的市場經濟，是法制化的市場經濟，是道德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裙帶關係的市場經濟，不是腐化的市場經濟，更不是人吃人的市場經濟，這種理性的、道德的市場經濟，其實也就是人道主義的市場

經濟。如果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廣大民眾的利益，那麼這種理性的、道德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基督徒在中國還是個很小的少數人羣體。因此，基督徒倫理的社會影響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被當前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和法規人為地限制了。基督徒要想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需要加強跟政府官員的溝通，敢於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在可能的時候積極參與政府的決策，這才可能更有力地推動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發展。在我看來，中國的基督徒個人基本上能夠做到獨善其身。至於能否兼善天下，則既要看政府是否給予他們必要的空間，也要看中國基督徒的自覺努力，包括基督教神學家和領導人的積極思考和引導，當然也包括海外華人基督徒的積極協助和參與。

(2005年5月28日初稿，2005年6月14日修訂)

註釋：

- 此文是為中國神學研究院2005年6月7至8日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研討會之公開講座而準備的。研討會的主題是「福音信仰對當代中國價值觀之意義」。感謝大會組織者的邀請和安排。張學峯、徐麟、王寄瀛等學者好友對本文初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議，在此亦表示感謝。歡迎批評指正和探討。聯繫地址：Fenggang Y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diana, 47907, USA. 電郵：fyang@purdue.edu 或 yangfenggang@yahoo.com
- 韋伯在1905年發表了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在1920年出版了修訂版。1930年Talcott Parsons 翻譯成英文在中國大陸。三聯書店最早在1987年出版了于曉等人的中文節譯本。
- 自發產生不同於引進輸入。不同社會中的宗教倫理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引進，也會有不同影響。受儒家影響的東亞社會引進資本主義的過程，表明儒

家也具備有利於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運作的倫理。

- 3 這些學者包括新儒學學者杜維明、社會學家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等。
- 4 見韋伯著《中國的宗教 儒教與道教》(台北·遠流·1996)。
- 5 基督教已經成為最多美國華人信奉的制度化宗教。見Yang, Fenggang, "Religious Diversity Amo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Religions in Asian America: Building Faith Communities*, ed. Pyong Gap Min and Jung Ha Kim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2002), 71-98.
- 6 這個課題由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任楊慧林主持立項，由楊鳳崗設計指導，得到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也得到PES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 Purdue University,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Religious Research Association以及一些個人的資助支持。在此謹對所有的支持者表達我們由衷的感激。也感謝參與田野調查的數位學者和研究生產此的辛勤工作。感謝教會和各地領導為此積極配合，更感謝眾多基督徒接受訪談。
- 7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 至 30 節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裏。』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參考書目：

- Constable, Nicole.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ng, Fenggang. 1999.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